

民族学研究

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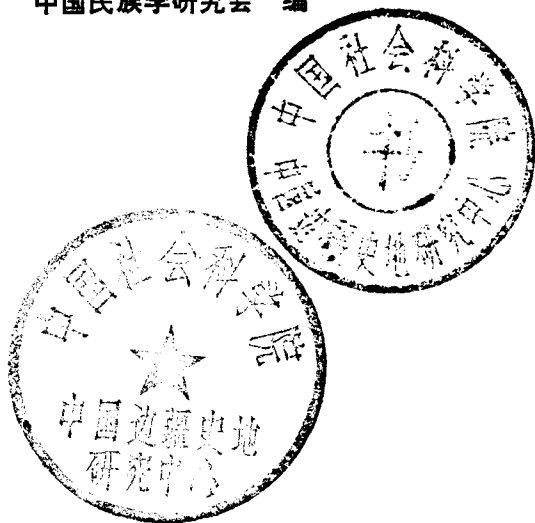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民族出版社

民族学研究

第四辑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 编



民族出版社

民族学研究

第四辑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3/8 字数：24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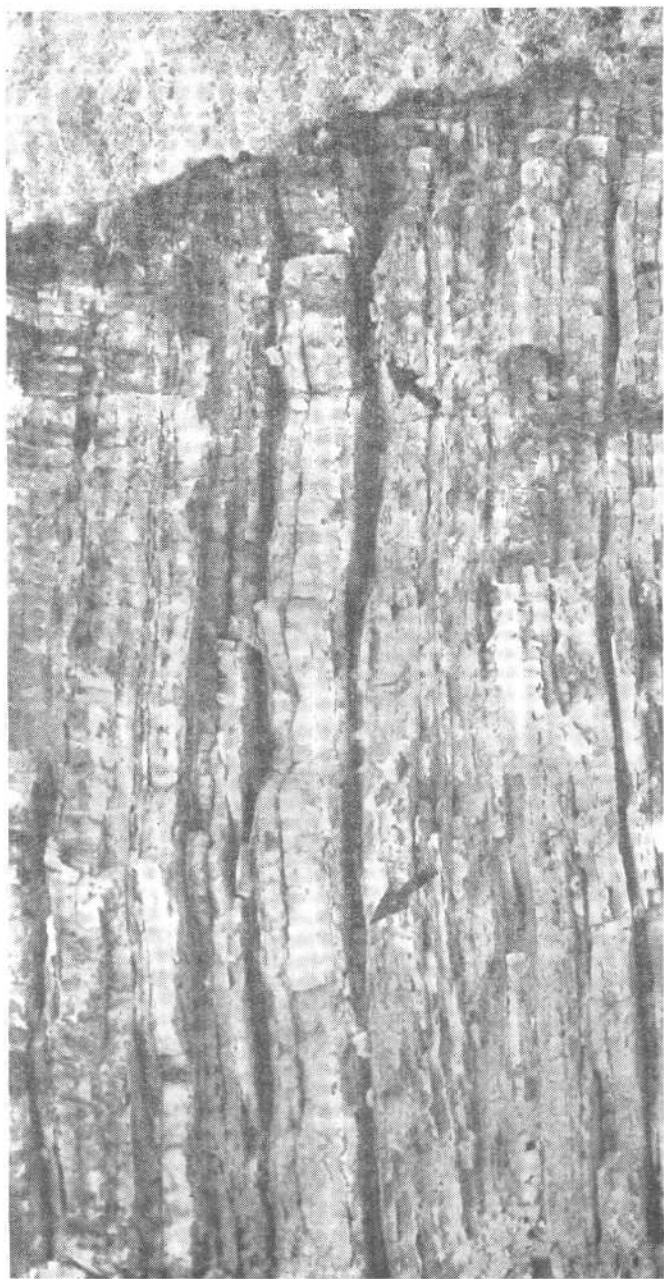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精装本印数：0001—1,000册 定价：1.2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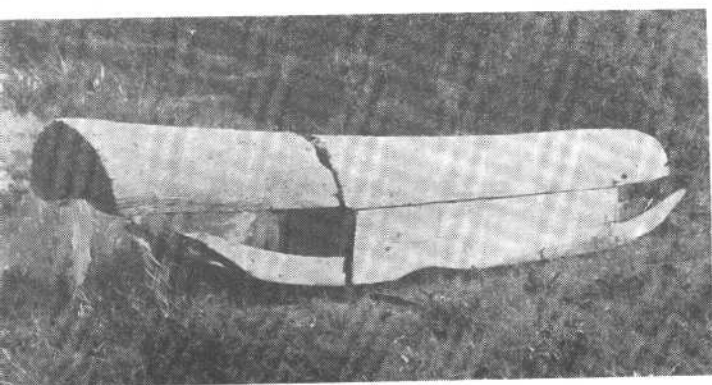
平装本印数：0001—6,000册 定价：0.75元

书号：3049·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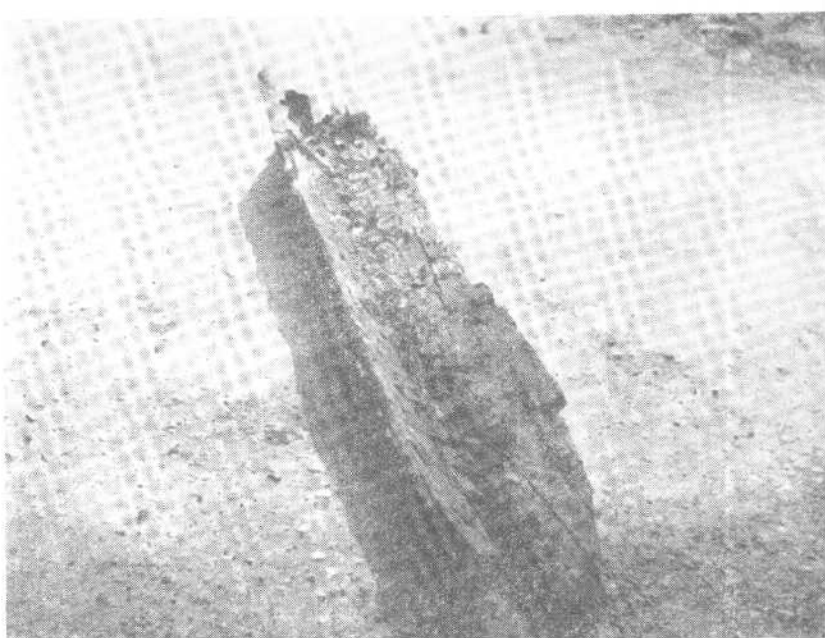


湖北省钟归县王家坪棺木岩棺木放置情况（箭头所指缝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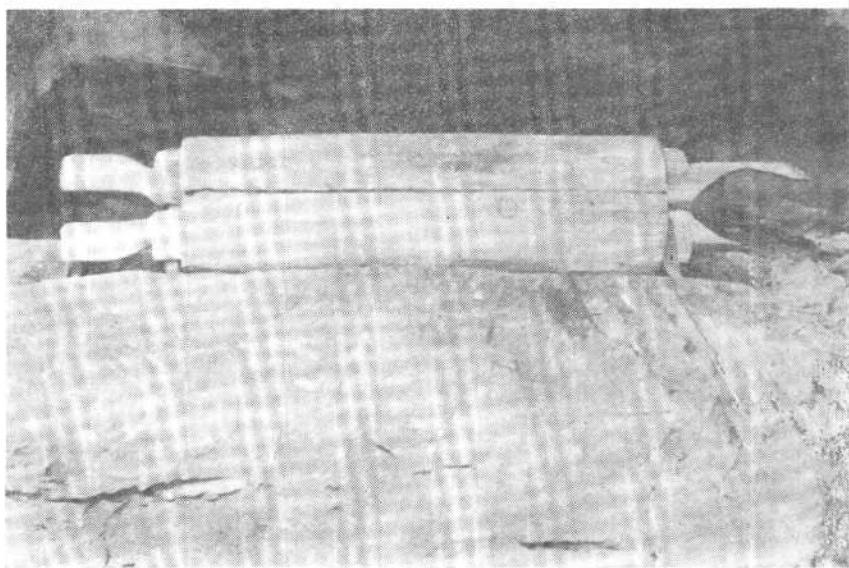
浙江省遂昌县古市
区新兴公社大石太
队尖砭背崖墓
(棺在崖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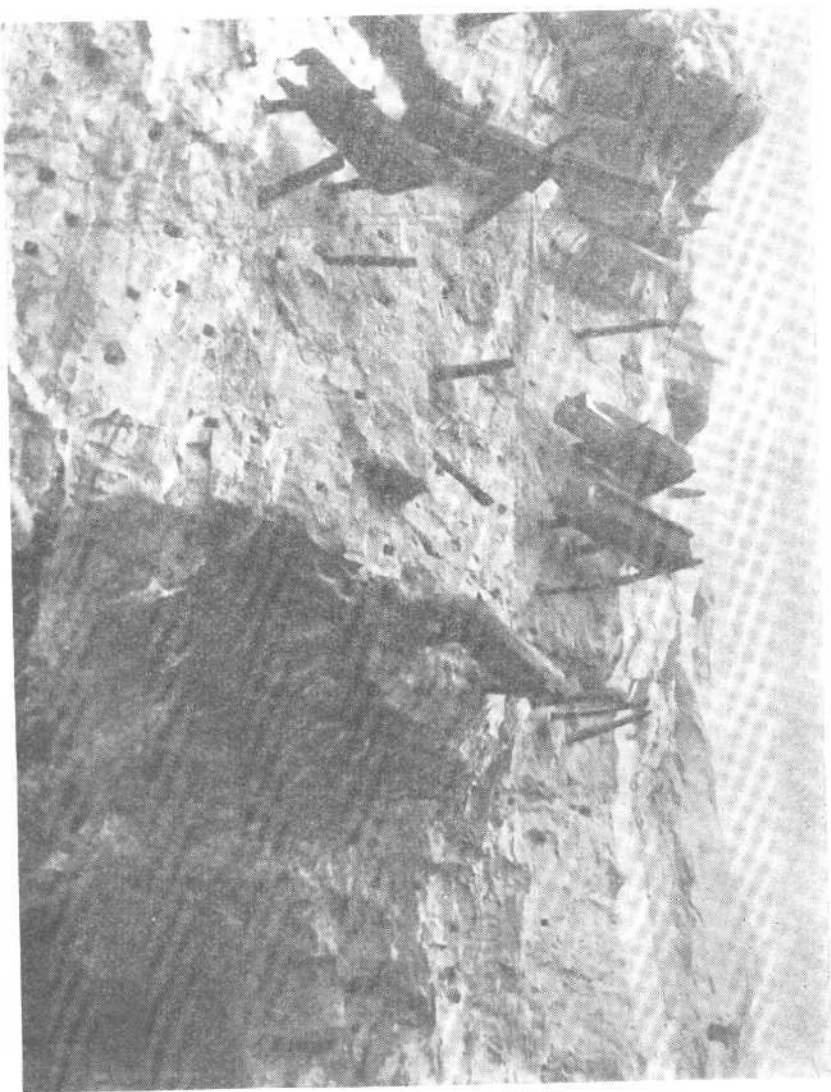
福建省崇安
县白岩船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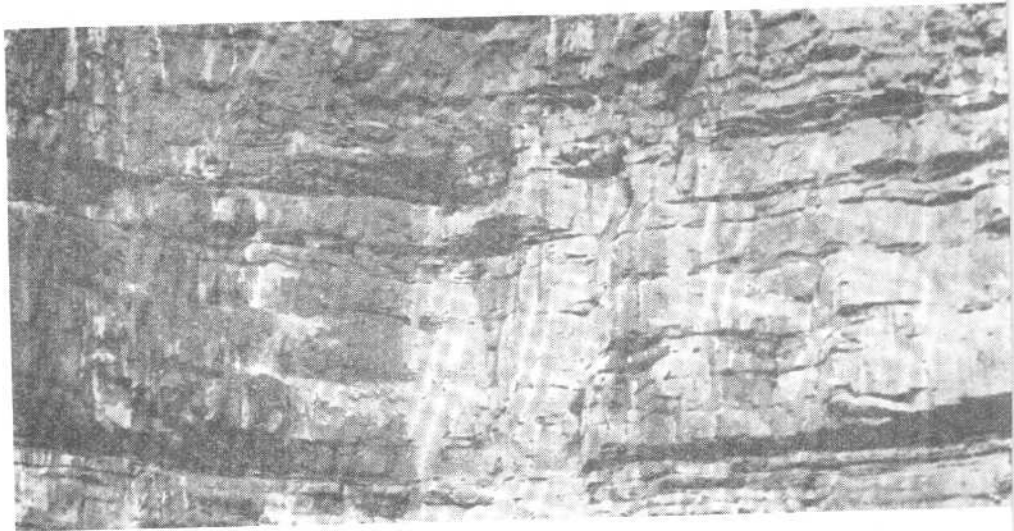
湖北省宜昌县新坪棺材岩之棺木（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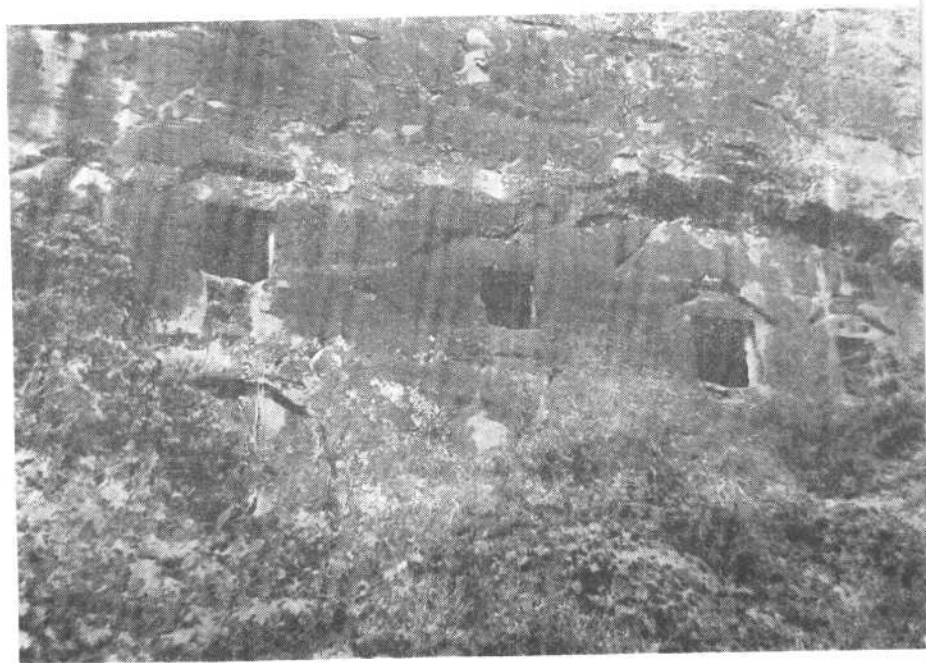
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邕宁崖洞葬之木棺



四川省珙县麻塘坝九盏灯悬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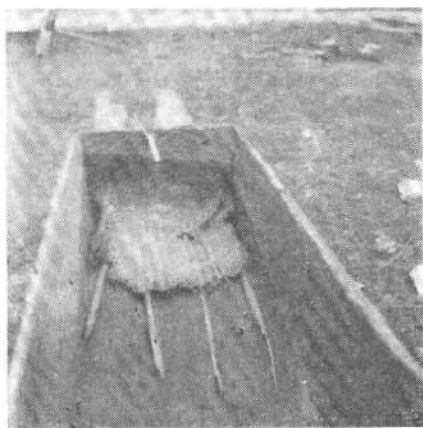
四川省巫溪县棺木崖东区的崖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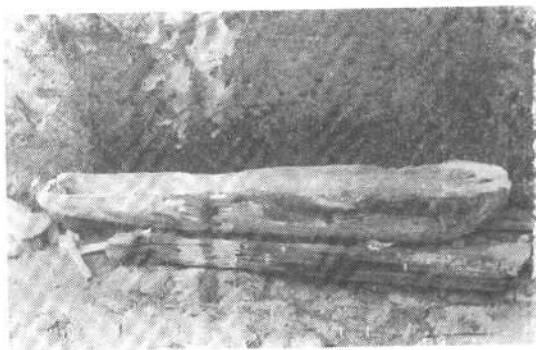
四川省高县罗场崖穴墓



四川省高县罗场明洪武年间崖穴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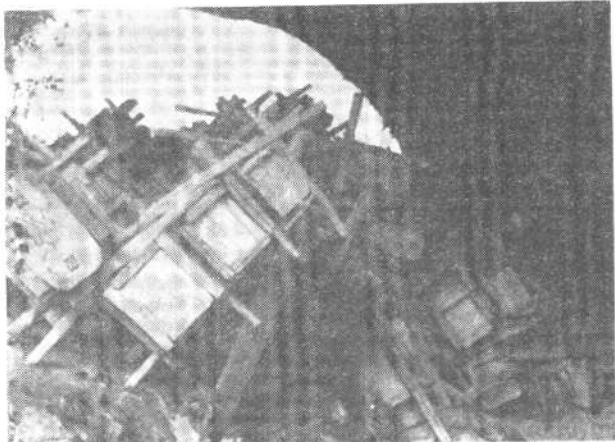


武夷二号船棺棺底垫的竹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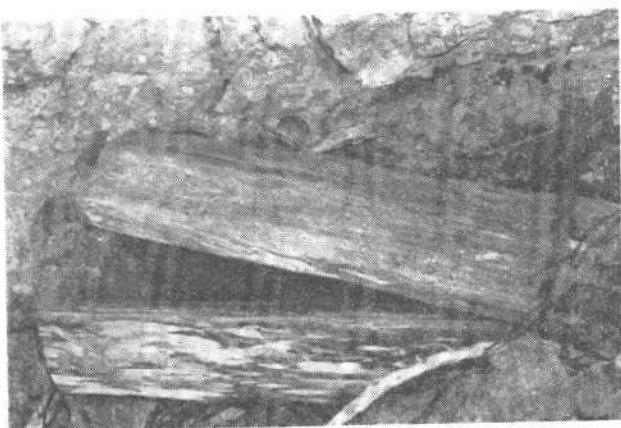


贵州省松桃县仙人岭船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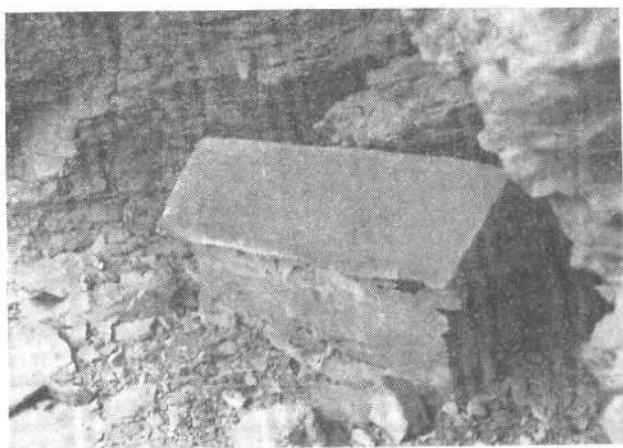
贵州省惠水县摆
金棺材洞崖洞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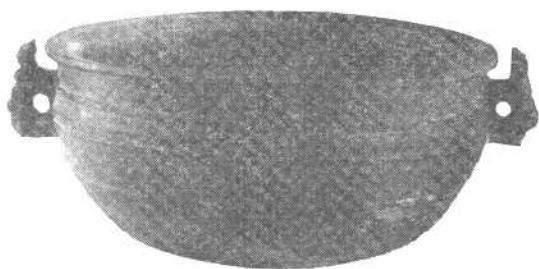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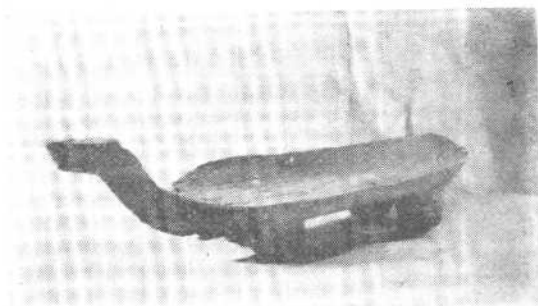
贵州省罗甸县沫阳
区油尖寨崖洞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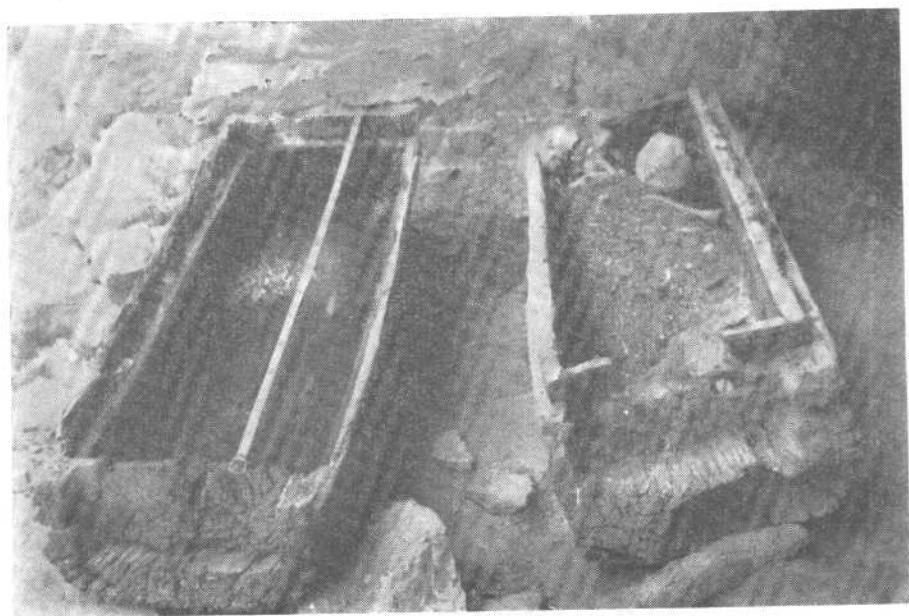
贵州省岑巩县桐木
白崖人字形悬棺



武夷二号船棺龟状木盘



江西省贵溪县仙岩
崖墓中出土的陶盂



四川省巫溪县荆竹坝18号棺

目 录

一项不应忽视的民族学课题 ····· 秋 浦 (1)

试谈我国东南地区悬棺葬的几个问题 ····· 林华东 (6)

武夷山崖棺葬溯源 ····· 陈 龙 狄宠德 (18)

武夷山悬棺葬年代与族属试探 ····· 林忠干 梅华全 (32)

武夷山崖洞墓问题的探讨 ····· 蒋炳钊 (47)

有关武夷山地区悬棺葬的几个问题 ····· 彭适凡 李 放 (60)

对贵溪崖墓时代的商榷

——兼谈与越文化有关的问题 ····· 刘 林 李家和 (75)

广西崖洞葬和几个有关问题的商讨 ····· 张世铨 (85)

四川悬棺葬 ····· 石钟健 (100)

为川南“樊人悬棺”正名 ····· 李绍明 (119)

黔南悬棺葬及其族属初探 ····· 雷广正 莫俊卿 (132)

对岩葬几个问题的探讨 ····· 潘世雄 (141)

试论悬棺葬的族属及性质 ····· 曾文琼 (153)

崖葬与越僚关系 ····· 梁太鹤 (165)

悬棺、铜鼓及其他

——也谈悬棺葬族属有关的问题 ····· 李伟卿 (178)

崇安武夷山船棺出土纺织品的研究 ····· 高汉玉 王裕中 (192)

“樊人悬棺”岩画中的珍狗俗 ····· 沈仲常 (203)

珙县悬棺附近之崖画和沧源崖画 ····· 汪宁生 (205)

从民间故事看川南悬棺葬的族属 ····· 杜品光 (214)

高县岩穴墓及其石刻考 ····· 何泽宇 (219)

荆竹坝M18号崖棺两具尸骨的鉴定·····	秦学圣 (226)
台湾高山族的崖葬·····	陈国强 郭志超 (230)
武夷山船棺的分布及现状·····	崇安县文化馆文物组 (234)
湖北秭归、宜昌三处悬棺葬调查简记·····	舒之梅 (238)
湘西酉水流域崖墓考察·····	谢心宁 (243)
广西左、右江地区崖洞葬初步调查·····	张一民 (250)
川东峡江地区的崖葬·····	林 向 (261)
贵州松桃、岑巩悬棺葬清理记·····	席克定 (277)
· 学术动态 · 关于悬棺葬的学术讨论·····	(明) (288)

一项不应忽视的民族学课题

秋 浦

人生一世，都免不了有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完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死了，其遗体需要加以处置，也是件极其自然的事。葬丧，正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习俗。

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初具形式的丧葬活动，是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墓葬，其年代距今大约在十几万年到几万年之间。无论是在德国或是法国的洞穴中发现的尼人遗骸，其周围都散放着若干石制工具和一些石块，象是活着的尼人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我国“山顶洞人”的遗骸周围，也留下了类似的痕迹。无疑，这是和当时灵魂不灭观念的产生密切有关的。人们正是通过这种有意识的安排，企望业已死去的亲人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照样生活得很好，并且保佑着他们的子孙后代，繁衍昌盛。

尽管人们为死去亲人举行丧葬活动的主观愿望是如此的简单，可是各种丧葬形式却很繁杂，在各个民族中是很不一致的。在森林中狩猎的民族多实行树葬，亦称风葬。游牧民族有的实行野葬。滨水而居的一部分民族多实行水葬。有的民族以火葬为最洁净，碎尸让鸟食尽的鸟葬为最吉祥。很多农业民族则多实行土葬。这里面，丧葬形式既受着不同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受着人们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不特如此，在同一民族中，其丧葬形式，前后也并不是一致的，有的甚至在同一期间可以并存着多种丧葬形式。而历代的帝王将相，生前贪婪地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膏血，更是在堆堆白骨之上，建筑起了一座座豪华的地下宫殿，作为自

已永世享受、永恒权力的象征。这就在丧葬形式上打上了浓重的阶级的烙印。

悬棺葬，又名崖葬，也是若干古代民族的一种丧葬形式。它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长江流域的十余个省区，东起台湾，中经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区和陕西的南部，西到云贵高原，绵亘万里。这是一种极其奇特的葬俗。它不用埋葬，而是把棺材置于悬崖绝壁之上。其置棺方法，或者是利用天然岩洞，或者是用人工凿石成穴，或者是凿孔安桩，有的是利用两个临近的断崖之间架设横木，置棺其上。在缺乏起重设备的古代，如何能把数百斤重的棺材，置于高达数丈乃至数十丈的悬崖绝壁之上，至今仍然是耐人寻味的。在川南珙县麻塘坝，我曾亲眼见到只有飞鸟才能到达的峭壁上，竟然一层一层地排列着棺材。不少地方，棺材纵然因年久坠落了，但原来安桩的孔眼，仍然清晰可辨。这不禁使我很自然地忆起了宋代学者朱熹“武夷山上有仙灵”的诗句。当然，仙灵是从来没有过的，只是一时难以找到更恰当的解释，朱熹才发出了如此的感叹而已。

历代文人学士，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极其奇特的葬俗，并且留下了不少记载。到了近代，又有一些中外学者到实地考察，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所有这些，都为继续深入地研究悬棺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所有这些，都一概被斥之为“猎奇”，是“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具体表现”。这种粗暴的“批判”，不仅不能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在实际上对学术研究也起了扼杀的作用，使这方面的探讨中断多年。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否就不应该研究这一类问题？答复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应该不应该去研究，而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诚然，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对于民族学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例如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的问题，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等等，是应该化

大气力着重进行研究的。不这样做，就难以避免舍本逐末之嫌，使人感到位置摆得不适当。但这绝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丧葬就是这一类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事实上，对社会某一个侧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既可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也有助于重大研究课题的深入。因为任何一个侧面，都是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拿包括悬棺葬在内的丧葬来说，研究它，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对某一民族某些风俗习惯的形成和变迁，获得一个正确的了解，而且有着多方面的意义。这一点，只要透过对已经发掘清理的五十多具悬棺作些分析，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福建武夷山地区共发掘清理了两具悬棺。其中观音岩悬棺的碳素测定为距今 3840 ± 90 年， 3370 ± 80 年，白岩悬棺为距今 3445 ± 150 年，约当夏、商之时。这是已知的悬棺年代中距今最久远的。悬棺类似独木舟形式，故又名船棺，采用楠木，其坚硬程度，显然非铁质工具难以加工制成。可是南方铁器的发现却是在春秋晚期。这种现象究应作何解释？是碳素测定数据偏高？还是铁器出现的时间应比这更早，只是没有被发现？再从各地已经发掘清理的悬棺来看，棺内都有若干随葬品，其中包括石器、陶器、瓷器、铜器、木器和竹席，各种棉织品、丝织品和麻织品，还有其他一些文物，这都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生产发展水平和工艺水平。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变革，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弄清上述这些的确切年代，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

自武夷山而西，各地悬棺的碳素测定年代依次递减，由春秋、战国而东汉、西晋、唐、宋一直到明、清。这是否意味着这种丧葬形式是由东而西逐步传播的？假如肯定这点，那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诸岛屿也流行着这种葬俗，又当作何解释？再者，古代盛行这种葬俗的民族，与今天生活在南方各地的民族的关系又当如何？这就牵涉到一些民族的历史演变

和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这将会大大丰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形成和发展的研究。

从已经发掘清理的悬棺中，还可以由棺内的尸骨及其卧式，随葬品的陈放，联系到悬棺距离地面的高低，悬棺的排列次序，了解到当时人们婚姻、家庭和社会组织的状况，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造型艺术以至体质和病理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不再一一申述了。

总之，古代丧葬乃是研究古代民族文化的一座宝库，这里是有着取之不尽的矿藏的。

当然，研究包括悬棺葬在内的丧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它还具有另一方面的现实意义，这就是通过对大量材料的研究，必然引伸出丧葬应当简化、丧制需要改革的结论。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国各民族人民，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灵魂不灭的另一世界是不存在的。追念已死亲人的最好方法，不是在丧葬上无谓地耗费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而是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各民族人民只有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可以使自己生活得日益美好，并造福于子孙后代。任何依靠祖先保佑、神灵恩赐的想法，都只能是一种幻想，其结果是一定要落空的。

如上所述，对各民族的丧葬进行适当的研究，乃是民族学工作者不应忽视的一项课题。民族学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作出完全合乎历史实际的阐释，一扫前人在这方面所散布的种种迷信和陈旧观点。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所要求于我们的。

应该指出，要使这一问题更深入地展开，还有赖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共同作出努力。民族学不但需要与历史学、考古学密切结合，而且需要与体质人类学、群体遗传学密切结合。只有把各民族在丧葬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从现状到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即不但研究古代民族，还要研究现代民族，不但研究这一地